

刘珣 崔永华 总主编

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丛书

A Series on Standards for Teachers of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 中国文化常识

General Information on Chinese Culture

许树安 贾烈英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常识 / 许树安, 贾烈英著.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1. 11  
(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丛书)  
ISBN 978-7-5619-3171-4

I. ①中… II. ①许… ②贾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教材 ②中华文化—基本知识 IV. ①H195.4 ②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6233 号

---

书 名: 中国文化常识  
责任印制: 汪学发

---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 话: 发行部 82303650/3591/3651  
编辑部 82303647  
读者服务部 82303653/3908  
网上订购电话 82303668  
客户服务信箱 service@blcup.net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25  
字 数: 294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19-3171-4/H·11217  
定 价: 40.00 元

---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82303590

# 总 序

为提高国际汉语教师——在国内外从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学水平，培养、培训这一领域更多的人才，以满足世界各地日益增长的汉语学习需求，国家汉办组织研制了《国际汉语教师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并于2007年公布。

《标准》总结了国内外汉语教学的实践，借鉴了国内外外语教学，包括TESOL等国际第二语言教学和教师研究的新成果和相关标准，体现了国际汉语教学的特点，为建立一套完善、科学、规范的教师标准体系和国际汉语教师的培养、培训、能力评价和资格认证提供了依据。

《标准》分五个模块、十项标准描述了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的教师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模块一“语言基本知识与技能”由标准一“汉语知识与技能”和标准二“外语知识与技能”构成；模块二“文化与交际”由标准三“中国文化”和标准四“中外文化比较与跨文化交际”构成；模块三“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由标准五“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构成；模块四“教学方法”由标准六“汉语教学法”，标准七“测试与评估”，标准八“汉语教学课程、大纲、教材与辅助材料”和标准九“现代教育技术及运用”构成；模块五“教师综合素质”由标准十“教师综合素质”构成。

《标准》以概括的语言，对上述知识、技能、能力进行了简要的描述。为帮助相关人士了解标准的内涵，我们编写了这套辅导丛书。本丛书可以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标准的内容，学习相关知识、技能，也可作为汉语教师培训、辅导、自学的教材以及参加汉语教师资格考试的备考参考。

本丛书拟分为十个分册，各分册名称与《标准》的对应关系如下：

(1)《汉语基本知识（语音、词汇、汉字篇）》和《汉语基本知识（语法篇）》，内容是标准一中的“汉语知识”，包括汉语语音、词汇、语法、汉字四个方面；

# 第一章 中国的历史

## 第一节 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及朝代沿革

### 一、关于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世界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经有过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希腊等古老文明，但它们发展到一定时期后都因为种种原因而中断，只有中华文明自古至今从未中断。

20 世纪 80 年代，对远古四川巫山人颌骨、牙齿化石的考古发现和对远古安徽繁昌人遗址的考古发现，把中华大地上人类生存的时间上推到 200 万年前。从而引发了某些学者向“人类起源于非洲”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他们认为人类的起源地或许不止非洲一处。有关中华文明的起源，还有许多悬念有待我们去破解。过去我们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现在考古发掘的新成果使我们的视野更宽广了，思路更开阔了。20 世纪 80 年代初，内蒙古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发现，充分证实了 5500 多年前那里曾经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社会。这一考古发现使中国古代史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展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先进于同时期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这引发了学者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多种思考和讨论。

20 世纪 60~90 年代，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经过多次发掘，发现了 17000 年前的

人骨化石以及精美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其中的夹粗砂条纹陶、绳纹陶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器。此外，还发现了 12000 年前的野生稻植硅石和 10000 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这是现今所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之一。

1973 年以来，考古学家对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古代文化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那里的文化遗存最早可追溯到 7000 年前。当时的先民们生活在今天的宁绍平原上，已经广泛种植水稻，考古发掘出的稻谷化石换算成新鲜稻谷竟多达 12 万公斤，可够 500 人吃 1 年的，可见当时水稻种植业之发达。更令人惊奇的是，当时人们在建造房屋时已经使用了非常先进的卯榫结构和地板拼合的企口技术，这是中国木结构建筑最基本的两项要素，一直沿用至今，它们是 7000 年前的河姆渡人在没有金属工具的石器时代发明的。

安徽省境内的凌家滩文化遗址距今 5500~5300 年，与红山文化同期。它的发现证明，巢湖流域跟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这里出土了一个 4.25 公斤的大石钺，这种礼器石钺的出现，显示当时可能已经存在社会地位的高低之分。祭坛是神权和王权高度集中的表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迄今为止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祭坛，而且建筑方式比同时期的红山文化和较后的良渚文化的祭坛都要先进。红山文化的祭坛是用石块堆积的，比较简单；良渚文化的祭坛是用三色土夯实的；凌家滩文化的祭坛则是底层为夯土，第二层为石块，第三层是三合土铺成的。这个祭坛的存在给我们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即早在 5000 多年前，巢湖流域就可能有国家的雏形存在了。

在凌家滩文化遗址发掘中，发现了 3 件玉龟和马蹄桶形的玉桶，桶内装有 5 根玉筓。这种马蹄形玉桶曾见于红山文化，都是占卜用的工具，两者处于同一时代却远隔千里，是当时有文化交流还是巧合？玉龟由背甲和腹甲构成空壳状，背甲上刻有龟纹。它们的出土表明我国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有关古人占卜之类的传说是有事实依据的。

同时出土的还有玉版，放在玉龟的空壳中。玉版长 11 厘米、宽 8.2 厘米，四边有 23 个小孔，中间刻有八角星和圭形纹饰。古代文献上曾记载有“元龟衔符”的传说，也许这就是一个实物的印证。凌家滩一共出土了 6 件玉人。玉人那非常薄的耳朵上，还钻有小孔。当时的先民竟能用直径不超过 0.17 毫米的钻管在玉器上钻出直径 0.15 毫米的管孔芯，比人的头发还细，而且还必须是快速通过，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微型管钻工艺技术。从现代技术看，这种快速钻眼必然得有机械带动的工具，难道当时的制玉工艺已经有了皮带传动装置？

凌家滩玉雕表现出明显的先进性，其器类、形制、纹饰或雕工不见或罕见于同时代其他地区玉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凌家滩的玉器已经从饰品功能转向社会功能，

突出了玉的礼器作用。自凌家滩文化遗址 (安徽省境内)、良渚文化遗址 (浙江省境内)、红山文化遗址 (辽宁省境内)、兴隆洼文化遗址 (内蒙古自治区境内) 等广大地区相继发现大量的精美玉器后, 很多学者都认为, 在中国古代还存在着辉煌的玉器文明, 这也是中国古代早期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之一。

考古学家根据大量出土文物所传递的史前文明信息, 估计出以凌家滩为中心的巢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灿烂的文明社会, 在距今 5500~5300 年前它的文化达到了巅峰, 而后它就消失了, 究其原因很可能是水灾造成的。由于凌家滩遗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意义重大, 以致有的学者宣称在这里看到了“中华远古文明的曙光”。

良渚文化距今 5300~4100 年, 广泛分布在今太湖流域、宁绍平原、舟山群岛和江苏部分地区。在河姆渡人的艺术作品中已经出现蚕的形象, 而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则出土了绢的实物。这种 5000 年前的丝织品, 与现代丝织物几乎别无两样, 表明良渚人已经驯养了家蚕, 而且掌握了缫丝技术。良渚人还开创了一个辉煌的玉器时代。外壁为方形、中心部位为圆孔的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良渚人采用的玉石极为坚硬, 但是上面的纤细花纹可称得上是微雕杰作, 线条细到肉眼都难以辨认。先人们竟能够在 1 毫米宽度内刻画出 5 条细线。我们至今也没有找到他们制作玉器的工具, 这是石器、木器工具时代的先民们留给我们的一个难以破解的谜。2007 年底, 在浙江余姚良渚文化遗址处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 许多学者认为它距今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良渚古城的发现, 引发了人们的思索: 这是否意味着当时当地又一个雏形国家的存在?

在黄河下游今山东、江苏淮北等地区存在着一些以鸟类为图腾的部落联盟, 后来形成以蚩尤为首领的强大的东夷集团。大汶口文化是其中的代表。大汶口墓葬考古显示, 在距今 5000 多年前, 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开始形成, 氏族内人人平等的制度遭到破坏, 墓葬内陪葬品的多寡明显地表现出贫富的分化。在大汶口墓葬中, 有一种陪葬陶器上刻画着引人注目的图像符号, 像是太阳升起在山顶。学者们认为这个图像符号是有确定含义的, 可以看成是文字的萌芽或最早的文字。大约距今 5000 年的时候, 东夷集团与其西面黄帝、炎帝的华夏集团发生战争, 最终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最早的华夏族团。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四川广汉三星堆巴蜀文化遗存的发掘表明, 三星堆古蜀国文明是长江上游地区中华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 具有全方位认识古蜀社会及探索上古社会概貌的重要学术价值。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 1500 多年, 然后又像它的突然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三星堆遗址表明, 它应是中原夏商时

期甚至更早的一个灿烂的文化中心，并与中原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

上面所举的一些远古时代的遗存，都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这一切充分地表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并非是以中原地区一处为中心，它是多中心的，这些古代文明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的诞生与繁衍成长。

然而，距今约 5000 年或更早些时候，中原地区四周的一些强势文化衰落了，如前面所说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究其原因，一些学者认为，首先在于气候环境的恶化。当时水涝比较严重，我们看到南方的许多遗址都处在高地上，北方中原地区则由于有大禹治水，用疏导的办法基本解决了水患问题。与中原不同的是，一些周边地区的先民或者迁徙到别处，或者更多地求助于鬼神，例如良渚文化中贵族墓葬里的随葬品有相当多的琮、璧等祭祀品，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红山文化的墓葬中也有许多玉石等祭祀品，还有独具特色的女神像、女神庙，呈现出浓郁的宗教祭祀氛围。这一切告诉我们，祭祀活动在这些先民的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为了祭祀而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最终耗尽了自己的生存能力。相比之下，在对待人和神的关系上，中原的先民们更具有理性，虽然也有祭祀，但非淫祀，而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把人类的社会战争活动与对神的祭祀同等看待。由于四周强势文化走向衰落，中原文明得以凸显出来。其后，中原文化的进步带动了周围地区的发展，这就给人留下了一种印象，即黄河流域文化比较发达，然后影响到四周。

中原地区神权与世俗并重的文化渊源，造成此后中华文化朝着尊天神与重道德并驾齐驱的走向发展下去。

中华文明的源头为我们展现了灿烂的光辉，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悬念，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2000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发起的国家级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了，这是个多学科的综合研究项目，许多专家学者已经投身其中，远古历史的面纱正在一层层地揭开。

## 二、关于南北两个农业体系的起源

农业的发展推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基本上依靠农业收获得以繁衍生息，因此，农业是中华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中华农业早在 1 万多年前就在本土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祖先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率先提出：中国远古存在两个农业起源，即北方黄河流域的粟（小米）作农业



和南方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

粟作农业起源于中国北方黄河流域，这早已得到文献和文物的证实，中外学者未有重大分歧。中国整个北方都种植粟和黍（黄米）作物，农具有了改进，聚居和生活的场所不断扩大，人口明显增加。2006年，考古人员从红山文化兴隆洼遗址的泥土中筛选出已炭化变黑的人工栽培的小米，这是世界上迄今出土的最早的小米，距今已有8000年历史。

大约距今5000年前，这种粟作农业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开始向外传播：往东传到朝鲜半岛，传到现代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一部分到了日本的九州半岛；往西传播到甘肃、新疆；往南，长江流域有一些旱地也种小米。

关于稻作农业的起源，以前外国学者认为起源于印度。后来日本学者又提出起源于东南亚的北部山地。前面提到，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的稻作农业已经十分发达了，在一处窖藏中就发现了12万公斤稻米。有意思的是，在一个陶釜的底上竟然发现了一块锅巴，证明当时确实能够把稻粒加工成大米并且做成了米饭。这显然已不是人工培育水稻的早期阶段。

20世纪80年代，在湖南洞庭湖西边的澧县发现彭头山遗址。那里有很多红烧土，里面有稻谷壳，而且遗址的陶器里面也掺着稻壳。研究发现它们也是栽培稻，不是野生稻。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7000年，比河姆渡文化又早了一两千年。前面提到，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发现了稻谷，那是10000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和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硅石（植物硅酸体通常叫做植硅石）。水稻的稻叶上面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硅酸体，不会腐烂，在高倍显微镜下可从土壤中分辨出来。由于这种特殊形态，可以将水稻跟别的植物区分开。尽管我们没有找到稻子，但是找到了稻子腐烂以后的这种硅酸体，从而证实了水稻的存在。

20世纪90年代，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发现了几粒稻子，同时也有硅酸体。这几颗稻粒又像野生稻，又像栽培稻，恰恰反映出这种过渡，时间距今12000多年。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的稻粒。从此，稻作农业起源于中国长江流域的结论被学者们广泛认同。实际上，距今12000年前中国的人工栽培农业已经起步了；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时候，中国南北两个农业体系就已经形成了。这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

中国的两个农业体系分布在南北两大地区，但两者又紧密互补。北方旱地农业歉收了，南方的水地农业可以作补充；南方水地农业歉收了，北方旱地农业可以作补充。而且这两个农业体系涵盖的土地非常广阔，经济实力雄厚，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至今而从未中断的重要物质保证。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两个农业体系的哺育下成长起